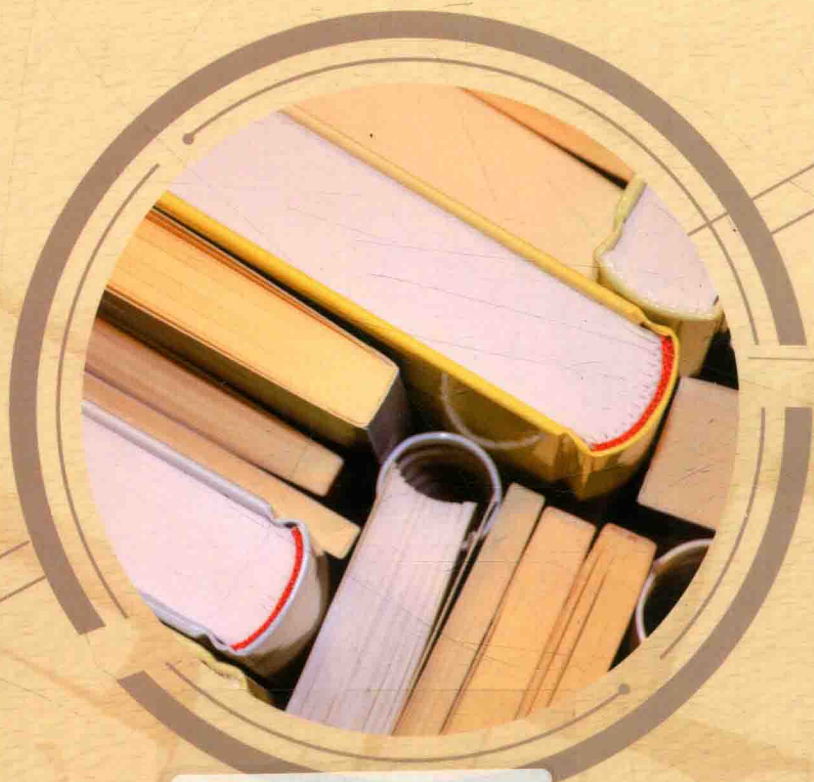




时代背景下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研究

赵娟 渠佳敏 梁雯 著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时代背景下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研究

赵娟 渠佳敏 梁雯 著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研究 / 赵娟, 渠佳敏, 梁雯著. -- 北京: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022-9848-7

I. ①时… II. ①赵… ②渠… ③梁…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26535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研究了自五四时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特点。全书内容详略得当,脉络清晰,重点突出,逻辑严密,语言流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更加细致思考的同时,梳理了现当代文学的创作特色。

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研究

出版发行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43 号 100048)
责任编辑 张 琳
责任校对 冯莲凤
印 刷 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41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22-9848-7 定 价 82.00 元

网址: <http://www.aep.com.cn> E-mail: atomep123@126.com
发行电话: 010-6845284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当前,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就中国文学发展现状而言,在对于外来文学进行引入的同时,本土文学也得到了更强的生命力。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当前我国文学商业化的现象愈发严重,不仅存在着抄袭情况,还存在着对于传统文学的轻视。因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促进中国文学良性发展。

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上来看,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不断转换,每个时段的焦虑中心不同,其文学创作的特点也各有差异。在一百多年的文学历程中,现当代文学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变化,它在每个时期侧重点不同,反封建、反理学、反宗法、反侵略、反阶级压迫,启蒙、建设、改革、开放,它不时地游离,有过许多曲折,却在不断前进。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一些学者以文学体裁演变为框架、以流派更迭为线索,通过以叙述为主、辅以适当的评论方式追溯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化,分析各阶段、各流派作家的创作特征与作品的意义,这种方法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使得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特色与其发展的时代背景相脱节,难以表现出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时代意义,以及其反映的社会风貌。鉴于此,作者在参阅大量相关著作文献的基础上,将现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与其时代背景相联系,撰写了《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一书。

本书共十二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阶段为纵轴,在横向分析这一阶段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研究。本书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分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时期、战争时期、新中国十七年时期、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六个时期,各时期均包含两章,第一章为文化背景介绍,第二章为文学创作研究。具体来看,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随着晚清启蒙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扩散、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文学社团的兴起,现代文学开始迈出新的一步,这一时期的作家开始用新文化的价值观念衡量和评价历史生活与现实生活,批判旧生活,憧憬新生活,五四文学也随着产生变化,白话文学形式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在革命文学时期,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精神观念,但五四时期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志的、具有斗争精神与激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革命文学迎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在战争时期,战时形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强有力地制约了文学的发展,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色彩,各区域的文学思潮走向,表现为不同的目的指向和发展脉络。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在继承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指导,对新中国社会的新风貌进行了生动而形象的描绘。到了20世纪80年代,“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成为艺术家普遍的追求,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20世纪80年

代的文学大步向前,步入文学的高速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瓦解与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影响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逐渐发生改变。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性多层次的审美趣味分化了原先二元对立的艺术观念。多种冲突与对立的并存构成了“无名”状态的基本格局,并不断形成了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趋向。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正是在这种“无名”状态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叙事立场和表现形式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互为关联的变化,作家们有了更多表达个人对世界看法的自由空间,他们回到个人的叙事立场,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审美形态,创作风格上具备了个人化的特征。

在创作上,本书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第一,时代历史所赋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殊使命,使之出现了一大批大家与名作,并在整体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可以说现当代文学的创作特色与其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本书在紧密联系、深入探索这种相关性的基础上完成。第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向前发展,由一元走向多元的格局,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到吸收西方文学思潮而内化成的现代主义文学,再到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后文学的多元发展,本书也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一变化展现了出来,阅读本书,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现当代文学的了解。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不仅参阅、引用了很多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而且得到了同事亲朋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专家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8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文化背景研究	1
第一节 晚清启蒙运动	1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	8
第三节 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	14
第四节 文学社团的兴起	18
第二章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	23
第一节 小说现代化的开创者——鲁迅	23
第二节 社会问题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创作	27
第三节 白话新诗的创作	37
第四节 散文的革新	46
第五节 新剧种的引入与发展	50
第三章 革命文学时期文化背景研究	53
第一节 革命文学的倡导	53
第二节 “左联”的成立	57
第三节 左翼文学思潮	59
第四节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71
第四章 革命文学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	75
第一节 “现代小说五大家”的小说创作	75
第二节 左翼小说、京派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	84
第三节 现代诗人的“纯诗”追求	93
第四节 犀利的杂文和具有灵性的小品文	100
第五节 现代话剧的振兴	105
第五章 战争时期文化背景研究	110
第一节 文艺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110
第二节 文艺论争的频繁出现	114
第三节 三足鼎立的政治区域	120
第六章 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	125
第一节 政治领域分割下的小说创作	125
第二节 九叶诗派与七月诗派的爱国战歌	134
第三节 重视时局的散文创作	139
第四节 戏剧的袭旧与创新	141

第七章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文化背景研究·····	146
第一节 两次文代会·····	146
第二节 “双百”方针·····	147
第三节 政治运动下的文学思潮·····	150
第八章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	155
第一节 百花齐放的小说创作·····	155
第二节 抒情叙事诗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	162
第三节 抒情散文与报告文学的齐头并进·····	168
第四节 现实题材戏剧与历史题材戏剧并重·····	172
第九章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背景研究 ·····	179
第一节 文艺的复苏·····	179
第二节 新启蒙时代的回归·····	182
第三节 文化寻根的兴起·····	188
第四节 文学思潮涌动·····	193
第十章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创作研究 ·····	198
第一节 小说的开放性发展·····	198
第二节 诗歌的多元化呈现·····	206
第三节 回归个人体验的散文创作·····	212
第四节 现实主义戏剧的复兴·····	217
第十一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背景研究 ·····	221
第一节 市场经济时代对文学的影响·····	221
第二节 关于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义、本土文化的讨论·····	223
第三节 文学思潮的勃发·····	225
第十二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研究 ·····	235
第一节 派别林立的小说创作·····	235
第二节 诗歌的精英化与世俗化趋向·····	247
第三节 散文的市场化与新生代杂文的发展·····	252
第四节 新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	256
参考文献·····	260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文化背景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新发展。它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同时又吸取外来文化的养分,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来自于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却未能根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根源,社会上继续推行尊孔读经,旧文化思想严重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深感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他们利用晚清以来留学生译介的大量西方文学、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向民众宣扬灌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主义文化。总的来看,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先后发生了晚清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而西方文艺思潮也开始涌入,由之又兴起了各种文学社团。

第一节 晚清启蒙运动

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发轫于洋务后期形成的洋务知识分子(也称早期维新派),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并跨越辛亥革命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发生的文学变革与晚清的启蒙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要想深入了解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化背景,就必须要先了解晚清的启蒙运动。

一、启蒙运动发生的条件

在列强侵略和西欧近代启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晚清启蒙运动开启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就进入了没落的晚期。晚清70年中,中国落后挨打,接连不断地遭到列强侵略,大量的领土和主权被掠夺、侵犯,中国人民忍受莫大的痛苦和灾难,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随着列强侵略的日益深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向着半殖民地的深渊滑落。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并促成了在危机中变革图新的迫切诉求,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便是建立在对危机的认识之上,以国家富强、王朝中兴为目的的历史变革行为,并以此拉开了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序幕”^①,但是“洋务运动”进行的只是器物层面的变革,这

^① 刘中树,许祖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种变革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深层结构与精神内核。即便如此,“洋务运动”在促使晚清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等人发起了“戊戌变法”,标志着由洋务运动时代的器物层面的变革转而向更为深层的制度层面的变革推进。但是“戊戌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进一步推动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觉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在此期间他意识到了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新民说”,从此,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时代开始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主要是指17世纪末到18世纪诞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启蒙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德国的康德、费希特等人。概括地讲,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主要由以下观点构成。

第一,倡导天赋人权说,认为人人生来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

第二,主张社会契约论,强调人们为了更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天赋权利,通过契约成立政府,政府则“由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正当的权利”。同时,人们在订立契约成立政府时,并未放弃自己的权利,只是使这些权利由于得到政府的保护而更加安全。如果政府损害了人们的权利,实行暴政,那么,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另成立新的政府。

第三,为了对统治者的权利进行限制,防止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用权力制约权力,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分离、分立。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人们在拥有自己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应有按比例纳税的同等义务。

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国家的确立而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它作为人类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产生的精神文化财富,却随着资本主义向欧洲以外国家的征服和扩张而传播,成为后进国家的思想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争取人的解放,建立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理论武器。

中国晚清启蒙运动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列强坚船利炮威逼下民族危机意识勃发的局势中发生的。这点,与西方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自发地孕育产生于封建社会解体之时,并进而传播扩散,形成一个推动整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运动不同,它是在外力的催化下、西方思想的启发下开展的。因此,中国的启蒙思想都直接借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精华,作为对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对外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理论武器。而且其在使命上完全服务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形成近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要求。

二、启蒙政治团体倡导并推动启蒙运动

晚清启蒙思想虽然发轫于洋务运动后期的早期维新派,但是真正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范畴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启蒙团体。由于近代中国一直伴随着民族的生存危机,并且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地位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启蒙时代较长,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先后存在过目的相同,手段途径各不相同的三个思想启蒙团体:戊戌启蒙团体、辛亥启蒙团体和五四启蒙团体。这里重点说前两个团体。

戊戌启蒙团体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戊戌启蒙团体的一次公开集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戊戌启蒙团体的核心人物。

1890年春，康有为移居广州。不久，陈千秋、梁启超慕名前往成为康有为的学生。1891年，康有为接受陈千秋、梁启超的建议，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正式开设学堂，唤作长兴学舍。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麦孟华、陈和泽、林奎等青年学子先后联袂入学。由于来学习的人不断增加，万木草堂一再易址，1892年，康有为移草堂于卫边街邝氏祠，1893年，再迁草堂于广府宫仰高祠。来学者达100多人，陈千秋、梁启超充任学长，还特此装上一方匾额，题上“万木草堂”四个大字。1897年夏，万木草堂达到全盛时期。从1891年开办长兴学舍，到1898年戊戌政变时，万木草堂被清政府下令封禁，康有为在广州办学前后历时8年。这期间，正是康有为主动自觉地以办学的方式集聚维新启蒙人才和建构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的时期。在这期间，康有为与学生们探讨古今学术，研习江南制造总局译述的声、光、化、电等学科的西书，容闳、严复以及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书，都是学生涉猎的范围，从而培养了一批有近代西学知识和世界眼光的学者。梁启超、徐勤、麦孟华、韩文举等都是日后戊戌启蒙时代的得力干将。另一方面，康有为的几部重要的启蒙著作如《实理公法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些奠定了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启蒙大家的理论基础。

1895年5月初的“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启蒙团体集结的标志。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变法主张，而且它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的集结，标志着戊戌启蒙运动走向前台。之后，在维新派的运作下，《时务报》《湘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等相继成为维新派发表思想启蒙学说的阵地。概括地讲，在这一时期，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主张人类公理，宣传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力主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等，构成了戊戌启蒙的思想主流。

辛亥启蒙团体形成于1905年。该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其重要标志，孙中山、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人是辛亥启蒙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民报》《新世纪》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启蒙阵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启蒙著作。辛亥时期的启蒙思想主要集中在民主、自由、平等方面的宣传上，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三、启蒙运动中的文学革新运动

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把启蒙作为从神学的禁锢中进行自我救赎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把启蒙作为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思想工具。梁启超等人认为，给古老的中国注入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思想资源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之“本”，于是清末的文学界掀起了一系列的文学革新运动，希望能够借此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民”。这些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包括白话文运动、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一）白话文运动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文首先成为晚清启蒙知识分子改造的对象。“语言远

远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它跟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本身就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语言体系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价值体系。”^①正是由于语言有如此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晚清启蒙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针对文言文发起了白话文运动。这次白话文运动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提倡“俗文学”,为改良主义“思想之普及”服务。随着新思想的不断涌现,文言文已经无法适应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表达需要,成为近代民主与科学传播的障碍。

第二,主张言文一致。这不仅揭示出中国文学在语言形式上的症结所在,而且也指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向。

第三,提倡报纸、著书撰文改用白话,以开通民智。

第四,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具体说明了兴白话的八个好处:一是省日力,二是除矫气,三是免枉读,四是保圣教,五是便幻学,六是炼心力,七是少弃才,八是便弃民。“八益”的提出一方面体现出了倡导者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保圣教”的历史局限性。

第五,创造了60个“官话字母”,主张用两拼法“专拼白话”,走拼音化的道路。

在梁启超、黄遵宪、陈子褒、袁廷梁、严复、夏曾佑、王照等人所提出的这些白话文主张的指导下,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各省开展了白话文运动,为后来五四时期白话文学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完全中断文言文的使用,而是形成了文言、白话并存的局面,白话的翻译与创作都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即使是倡导白话的理论文章也是用浅近一些的文言写成的,并非真正的白话文,因此,还需要新一轮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才能够彻底打破文言文所带来的种种限制。

(二)诗界革命

中国的古典诗歌因为具有“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的作用,因而一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正统地位。但是自唐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晚清时已经衰落。梁启超早就看到了中国古典诗歌对新思想传播的束缚作用,于是,在1899年时,他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了自己对诗歌的新看法:“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道天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出世,必不远矣!”^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是很有必要进行的。为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革新,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具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20世纪支那之诗士矣。”^③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便

①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A].李欧梵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70.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饮冰室合集·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189.

③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饮冰室合集·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189.

是梁启超为解救诗歌命运开出的药方,也是诗界革命的三项具体要求。其中,“新意境、新语句”在梁启超那里被认为是“欧洲之意境、语句”,即西方的思想与学术文化,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领域;古人之风格则指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体裁格律,它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诗人的审美感受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的表现。”^①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主张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变革指明了方向,这次诗界革命的目的在于批判传统诗歌创作与时代脱节的现象,对诗歌所具有的“载道”功能中的“道”进行重新定义,即要用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取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从而实现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新思想的传播。

在1902年至1907年间的《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再次对诗界革命进行了阐释:“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②这次诗界革命的重点在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变革,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没有提出变革的要求。与前一次的诗界革命主张相比,在这次关于诗界革命的主张中,梁启超将“新意境”“旧风格”视为好诗必须具备的两项基本条件,不再提倡“新语句”,因为在他看来,“新语句”容易造成“堆积满纸新名词”的现象,不利于诗歌表达新的思想。

通过两次诗界革命,涌现出了一批新诗创作者,在这些创作者中,黄遵宪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成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人境庐诗草自序》),广泛反映了诗人经历的时代,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如《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对中日战争进行了反映,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帝卫国思想,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黄遵宪还通过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发展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新内容”^③,如在《今离别》四首中,出现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生事物,令人耳目一新。梁启超曾评价说:“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恨未能写其全集。”

总之,梁启超虽然在诗界革命中的两次主张并不相同,但是其变革的主旨是没有变化的,都是在提倡“利用中国传统的诗歌形式反映近代社会的现实矛盾,表达其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④。

(三)小说界革命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在这里,“小说”是指庄子在《齐物论》中所批评的“小言”,即一种浅识小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和“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为士大夫和上层社会所不齿。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独具慧眼,意识到了小说所具有的巨大功能,于是,在小说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明确提出“小说

① 刘中树,许祖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A].饮冰室合集·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23.

③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99.

④ 刘中树,许祖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2.

界革命”的口号,表现出小说革新的自觉意识。该文还明确道出了小说应有的启蒙角色,疾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通过上段文字说明,小说不应处于社会文学结构边缘,它应该来到中心位置,应该变成知识层自觉运用来进行觉世新民、疗救社会的有力武器,由此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

但是,梁启超并不是近代关注小说的第一人,提倡“新小说”的革新运动在晚清酝酿已久。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放眼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改革时政的政治主张,迫切需要利用各种文艺形式来开启民智、宣传他们变法图强的理念。他们办报纸、开学堂、提倡今语写作,注意到了小说的重要社会功能,敲响了“小说界革命”的前奏。在维新派人士中最早关注小说的人是黄遵宪。1887年,他在《日本国志》中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后来就出现了更多强调小说重要性的理论文字。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国闻报》发表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是一篇专门讨论小说价值的文章,文章把稗史小说与经史子集并举,肯定了小说在传导民情史实方面的作用。维新派人士把目光投向被正统文人视为末流、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正是看到了通俗浅近的小说对于开启民智的教化作用,希望小说能够成为醒世觉民的工具。

梁启超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但他从文学社会性的角度说明小说的重要性,强调了小说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社会作用,虽然有忽视小说审美性的缺陷,但在长期排斥、鄙视小说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有着叛逆“非圣不道”的文坛时尚,促进文学与时代相结合的作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晚清“小说界革命”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得到蓬勃发展。小说被誉为“文学之最上乘”,中国小说也从传统的才子佳人、讲史的模式中脱颖而出,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大量涌现,小说终于冲破了几千年封建文学的桎梏,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

小说界革命让小说担负起了“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的责任。受小说界革命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新小说,其“突出特点是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无不与救亡图存、改良群治息息相关,从而刷新了中国小说的格局,揭开了小说史上新的一页”^①。这一时期小说的种类繁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宣传政治主张的政治小说,此类小说常以拟构理想世界蓝图的形态出现,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颐琐的《黄绣球》等。《新中国未来记》以未来60年后的中国维新成功揭开序幕,昭示了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小说的主干部分是改良派黄克强与革命派李去病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一场大辩论,对20世纪初爱国志士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启超本人流亡日本初期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矛盾心理。这部小说打破了古典小说以故事为基本构架的叙事模式,大规模地融入散文和诗的笔法,从而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演说、口号、章程、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性。《黄绣球》通过一

^①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19.

个名叫黄绣球的女子的经历,叙说了自由村从蒙昧到文明的历史,寄寓维新派从一村、一地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该小说对女性问题进行了关注,对后来女性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类,描写外国事件的小说,此类小说通过描写国外发生的事件来寄寓国内的时局,如罗普的《东欧女豪杰》等。《东欧女豪杰》通过讲述俄国出身天潢贵胄的女杰苏菲亚不满专制暴政而投身虚无党最终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女英雄苏菲亚的光辉形象,同时对俄国虚无党的革命活动进行了赞颂。

第三类,反思历史疮痍的小说,此类小说通过描写晚清战争中百姓的遭遇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思,如连梦青的《邻女语》等。《邻女语》通过金坚在八国联军血污神京后北上的见闻展示了晚清乾坤含疮痍、日月惨光晶的历史画卷。

在小说界革命的后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为表达他们摆脱封建束缚、解放个性和建立平等的社会秩序的新时代要求,创作了一批狂飙突进式的作品,以陈天华的《狮子吼》和黄世中的《洪秀全演义》为代表。《狮子吼》批判满族贵族入关以来的暴行,鼓吹革命,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进行宣传。楔子将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混沌人种的灭亡;第二部分为睡狮猛醒的怒吼;第三部分为“黄帝魂”,对光复中华 50 年后的璀璨图景进行了畅想和构拟,表现了小说的主旨。《洪秀全演义》以艺术的笔触,生动地展示了太平天国波澜壮阔的反清战史,塑造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弘扬民族革命思想,并融入若干西方议会民主、男女平权等观念。

在小说界革命中,翻译小说也很兴盛,很多域外小说开始成为中国小说发展的参照系。其中,林纾所翻译的作品影响最大,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命题,昭示了知识阶层“平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的觉醒。第二,他从西方引进了风格流派的概念,对西方作家的风格进行阐发,从而给人以创作的启示。第三,他诱发了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其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就包含着现代性爱意识,以此表现现代人的独立人格、个性解放期望。林纾小说作品兼具中西方文学的特点,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简洁、隽永风韵特点,又体现了西方文学的灵思美感,为中国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模式。

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 20 世纪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该流派是发端于当时上海“十里洋场”一个文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平江不肖生、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鸥、冯玉奇、周瘦鹃等。他们分散在南方各地,后来多集中于上海、天津、北京几个大城市。这一流派最初热衷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并因此得名鸳鸯蝴蝶派。后来,题材扩展到了武侠、侦探、猎奇等。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李涵秋的《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当时也非常受欢迎。其中,《江湖奇侠传》被誉为武侠小说的先驱。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多为靡靡之作,文学性不强,品位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也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

总之,晚清启蒙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对中国文学实现现代性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到了 1903 年以后,这些运动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了,中国社会需要一

次更大的文学启蒙思潮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于是,一场文学革命即将发生。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袁世凯推行尊孔复古的文化专制政策,妄图继续用封建思想束缚人民,以维护其专制统治,这种做法让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不能容忍。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以求自由发展。这样,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了。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此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这一运动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没有现代报刊和新式教育的出现,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五四文学革命。所以,讨论五四文学革命要从一本杂志和一所大学说起。

新文化运动最早的策源地是《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5年9月该杂志在上海创刊,创办人为陈独秀。《青年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中明确指出青年应有的六种精神: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是他所呼唤的作为未来国民形象的“新青年”。在创刊的前几年,《新青年》集中发表了一批关于青年问题的文章,体现了《新青年》前期对“青年”和“青春”的热切召唤和期盼。因此,《新青年》起初倡导的思想启蒙,具有倡导青春文化的色彩。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不久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1917年1月,陈独秀奉民国教育部令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从此,《新青年》和北京大学这“一刊”“一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新青年》中的人大都是北京大学文科的教授,他们利用文章和讲台,介绍西方的现代文化,宣传反封建的新思想,引领追求真理、立志报国的有为青年,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伦理革命。除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还有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吴虞等人。他们将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伦理道德。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看到,“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的封建道德不仅成为个体自由发展的桎梏,而且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他们一致认为,反对封建专制首先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行彻底的、全方位的决裂,而首要的工作就是“刨祖坟”——打碎中国专制制度和礼教文化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于是,他们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思想武器,发起了围剿“孔家店”的搏战。他们并非是否定孔子和儒家文化本身,而是因为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他们以全盘反传统的偏激姿态,向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宣战,尤其是向封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道德秩序整体宣战。

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中国旧文化的同时,再造中国文化的建设意识逐渐浮出水面,主要文化参照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先驱们逐渐明确和集中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目标,那就是为中国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Democracy的音译“德莫克拉西”)就是民主,先驱们要以此对抗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思想。为了提倡民主,他们为中国人介绍西方的人权平等学说,破坏君权,确立四民平等的人权。“赛先生”(Science的音译“赛因斯”)就是科学。先驱们为了彻底地破除迷信,否定偶像崇拜,要借重用科学的知识、科学的宇宙观否定无神论思想,从根本上推倒“君权神授”和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很快,“民主”和“科学”不仅成了五四时期的流行语和关键词,而且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中心任务。以“民主”和“科学”理念为核心,西方的进化论(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逐渐为觉醒了的中國知识分子所掌握。他们在这些西方思想武器的指引下,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重新估定一切既有价值的气概,否定中国的旧文化,建设中国的新文化。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新青年》成为主要的阵地。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的眼光,对社会中的宗教、妇女、教育、劳工、文学,乃至贞操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文化批评和讨论的空气,让启蒙思想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得到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想自由的原则。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一是伦理革命,二是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文学革命”正式开启的标志。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并一一予以阐述。胡适所提出的这些内容涉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胡适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于是白话文学创作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的第二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目标,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这些主张表明了他对封建旧文学的批判态度,同时也从启蒙的角度对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抨击。陈独秀的观点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积极响应。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白话创作的支持,他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对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进行了阐述,并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由于他们二人的这两篇文章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注意,收效甚微,于是,他们二人采用双簧信的形式对白话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争论。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用旧文人的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各种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在这一来一往中,二人的观点得到了充

分的展现,最终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来了林纾等不支持白话创作的人的发难,同时也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关注,获得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对白话文学创作的支持。

紧接着,胡适又发起了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1918年4月,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新的宗旨,强调新文学的建设与新型“国语”的建设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明确了语言形式变革应为五四文学革命最主要的突破口。钱玄同尤为偏激,他主张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但多数人赞同以白话为基础,走“言文合一”的道路。

将文学革命从“白话的文学”推向“人的文学”高度的是周作人。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人的文学》,为正在建设中的新文学观念确立了一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命题。周作人把历来的文学分为“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两类。二者划分的标准在于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的态度。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明确了新文学的发展路径。诚如陈独秀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运动”,“人”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可见,在五四时期的人学思想中,具体到以个体为本位的生命、生存、婚姻、爱情等人生诸问题中,发现自我、创造自我、个性意识的自由张扬成为其中心,而这些却都是建立于生命意识的觉醒之上的。这种生命意识与个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所带来的新的审美意识,既是“人的文学”理念产生的深厚文化思想基础,又是其内涵的丰富意蕴,并成为文体现代性转换的内在驱动力。两者之间相互映照,人的意识觉醒促进了文体的解放,文体的解放又带来了人的新的审美意识的产生和情感的解放。

《新青年》一创刊就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些期刊在介绍各种西方思潮的同时,大量地翻译域外文化、外来文艺学说和文学作品。大量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也成为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和主要参加者都曾投身于文学翻译活动,一时间形成了一个翻译文学的热潮,同时也形成了外国文化艺术思潮百川汇聚的局面。

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阶级斗争的激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新青年》编委之间在刊物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由此,新文学阵营也开始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转向“整理国故”等纯学术领域,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投身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业,鲁迅、周作人等则带领一批文学新人继续在新文学战线进行不懈的努力。

然而,文学革命的事业没有因此而削弱。从1921年开始,大批文学新人结成的纯文学团体及其创办的纯文学刊物蜂拥而起,如璀璨的群星遍布神州大地。五四文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发扬光大,先驱们的新文学事业在他们的推动下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论争

起初,与文学革命倡导者对旧派文学热火朝天的攻击相反,旧派文学的支持者对这场文学革命几乎置之不理。先驱们为了打破这种寂寞,在《新青年》上人为地制造了一次“文学革命的